

# 红星照耀一代人成长

鲍世修

2017年，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传世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出版和他所拍摄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照片问世80周年。我是一位年近上寿的老者，回眸往昔，斯诺的这两件作品，伴随我从少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将近走过了一生，给我以知识、史实、眼界、智慧，乃至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走向。

当下，很多人对上述这两件具有国际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已相当生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来讲点陈年往事，也许不无裨益。

上世纪20年代末，我出生在江苏省北部的一个文化和教育昌盛的小县城东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抗日救亡斗争如火如荼展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934年到1938年，当我在家乡读小学期间，自己脑海里就比较模糊地知道，在全国抗日战线除由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外，也还有着—支由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抗日武装。不过，由于当时东台县城的所有宣传舆论工具都由国民党县党部所掌控，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任何有关“朱毛”的正面事实报道。

1939年，为避难，我随家人从东台迁居到上海，有幸进入上海一所名校、当时位于杜美路（今东湖路）的浦东中学就读。就在我念初中一年级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家位于威海卫路的公共图书馆翻阅外文旧杂志时，一本出版于1937年1月25日的美国《生活》杂志闯入我的眼帘；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该刊第9页，登载有一张醒目的人物照，那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拍摄的那张头戴红星八角帽的毛泽东戎装照。

在此之前，从国民党把持的舆论报道中，人们看到的所谓“赤匪”，可是

个个“面目狰狞”，但看到这张照片后，共产党领导人在我的脑海里，却有了一种可敬、可亲的印象。

正是在初中时期，我听说美国记者写了一本介绍共产党和红军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就已出版，译者为了躲避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乃青年人必读之书。但当时年幼，心向往却不知从何处才能觅得。1945—1947年，我在上海光华中学读高中。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大肆进攻解放区，青年学子对国民党政府违背民意打内战的做法十分不满，因而也就更多地希望了解共产党，于是《西行漫记》一书，便成了大家竞相找寻的“宝典”，我也希望能尽早找到一本。当时，我的学校位于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福煦路（今延安路）北，所以我常到离学校不远的福煦路上的一家进步书店“作家书屋”查询，却始终未能如愿。

1947—1949年，我在同济大学读书，课余生活极其丰富多彩。学生社团像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在这些社团里，男女同学唱着《山那边哟好地方》《你是灯塔》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跳着秧歌舞，聚在一起，畅议时事形势走向。在这种大家都在关心未来将要进入一个怎样的新天地的情况下，《红星照耀中国》便成了渴望进步的青年最希望阅读的书籍之一。我从同宿舍的地下党同学那里获悉，他们手里确有这本书。由于国民党当局查控甚严，传阅很是危险，我只能失之交臂。同学在我耳边悄悄介绍的书中主要内容，为我打开了一道探究新世界的缝隙。

1949年后，我参加工作，但岗位的性质令我无暇阅读《红星照耀中国》，只好将这愿望继续留在心里。但上世纪60年代，我开始专门从事毛泽东军事

思想研究，这本书便成了我常置案头的读物。了解越深入，便越能感受到它不朽的伟大力量。它以一支心灵驱动的笔打动人心，以一颗真挚透明的心影响世界，它与年轻人的心跳频率是一致的，令人热血沸腾。

被毛泽东誉为“纯粹的人”的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在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他为什么要下决心前来中国参加抗战，曾动情地说：“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吧，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印度年轻优秀的柯棣华大夫受到“红星”一书的启示和鼓舞，也毅然来华支援中国革命斗争。他们自豪地说：若问我是接受了谁的“命令”来到延安的，那么，我的回答是：我是接受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命令”来的。

许多读过《红星》一书的年轻人，如同他们的初恋一样，永远也抹不掉青少年时代启示灵感之源的记忆。多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外籍教师柯鲁克在1988年撰写的《〈红星〉指引我到中国来》一文中回顾道：“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时，我的人生道路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和妻子伊莎白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以中国为家，其中部分原因，也与读《红星照耀中国》有关。当《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首次出版时，我在西班牙国际纵队战斗，那时我被派到后方执行任务，有机会读到了此书。斯诺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报道打动了：五次反围剿，伟大的长征——特别是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穿越大草地……这些都使我心动心……1947年，我终于到了中国的解放区。”

柯鲁克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妻子伊莎白（亦译“伊莎贝尔”）已102岁，今

天仍然就在我们身边。她应当是这往事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人。

在中国近现代史各个时期，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中的不少人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社会基层和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第一线，向世界报道、介绍中国的实况，帮助中国人民赢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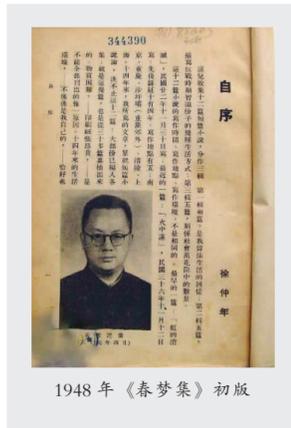
在长期交往中，他们同新中国老一代的国家领导人建立了一种彼此高度理解和信任的私人关系，而这种关系上升到国与国之间层面，就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使他们笔下的传播文字，神奇地转化成一种力抵千钧、实现国与国之间重大外交战略的推动力量。美国总统尼克松正是看了斯诺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对毛泽东的访谈文章，才迅速决定让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斯诺透露了主席对他所说的这样几句话：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不论是作为游客，还是作为总统——他上了一架飞机就可以来。

众多国际友人关于中国的报道，今天来看，仍有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报道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寻求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历程。他们留下的这些纪实，不少已被公认为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必读课本。他们关于中国革命和对敌斗争的外文著述，由于其明显的进步性质，往往很快就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从而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读者，促使他们积极地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去。

斯诺一生为传播正确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努力，体现了人类追求进步和公正的良知，永远值得中国人民铭记和珍惜。

# 被忽略的徐仲年先生

段怀清



1948年《春梦集》初版

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里，有一位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归国的女留学生苏文纨。其实，《围城》里与法国以及里昂大学相关的人与事，似乎尚不止于苏文纨。如果说1911年前留日学生曾一度独占清末留学之鳌头、1910年后留美学生继之声誉鹊起的话，1920年代之后，留法学生在现代留学热潮或留学运动中则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留法法国人所熟知者，大概是留法勤工俭学，实际上，在现代留法史上，持续时间更长、影响亦更为久远的，大概是里昂中法大学。鉴于当时在里昂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北平中法大学及里昂中法大学，故说苏文纨为里昂中法大学的留学生亦不为过。

有关里昂中法大学的作品，除了《围城》，现代文学史上至少还有两部长篇小说与之相关且值得一读，一部是苏雪林（1897—1999）的《棘心》，另一部则是徐仲年（1904—1981）的《双尾蝎》。二人均为1920年代初期留学里昂中法大学者，且所学均为文科，后来二人也都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所不同者，苏雪林的主业为中国文学研究，而徐仲年终身致力于法语教育、法国文学的翻译及研究，且在文学创作方面亦有不菲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仅归国后的30年代至40年代，徐仲年在教学工作以及学术研究之余，创作完成并公开出版的文学创作著述就有：

- 散文集：《陈迹》《海外十年》（回忆录）《沙坪集》《流离集》《读唐书》《春梦集》；
- 长篇小说：《谷风》《七色的霓》《彼美人兮》《双尾蝎》；
- 短篇小说集：《人间味》《鸛儿集》《双丝网》；
- 长诗：《逆波》；
- 剧本：《大青山》

上述这些著作，我不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多能检索到，甚至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系统中亦能找到。这不仅说明在抗战那个极为困难的时期徐仲年先生依然勤于笔耕、成绩斐然，而且他的这些文学创作，在当时也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 二

《双尾蝎》是一部以留法学生及其生活为主体的长篇小说，分上、中、下三部。上部1937年6月30日完成于浙江嘉兴。此部包括出国、留学两部分，以杨明辉、袁瑛夫妇双双获博士学位，且爱情家庭经过了小小波折之后仍得圆满保全，计划回国为主要内容。中部以归国及国内生活为线索，结合“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局势的变化，描写归国留学生在国家民族遭遇外侮之时如何独善其身又如何兼济天下，其中有不少对于留学生毫不隐晦的批评，对于当时国人多少有些盲目的“留学热”亦有不少反省，读之印象深刻。第三部分则是以余家煌与裴玉卿这一中一洋之间的结合作为开篇，而具有莫大反讽意味的是，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优等成绩学成回国且秉性仁厚的大学教授杨明辉，竟然一变而成为上海滩上一个私携枪文、为妻复仇的“基督山伯爵”。故事情节发展几乎完全颠覆了同时期一般留学生文学的叙事模式。

《双尾蝎》第三部分以袁瑛之死、杨明辉失踪以及余家煌、裴玉卿结合开篇，似乎喻示着一个看似美满、理想的留学故事的悲剧性的结局，以及一个更具有生命力的土洋结合的爱情故事的开启，再次印证所谓“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但令人意外的是，小说并没有如此安排，原以为熟悉本土生存法则的余家煌，竟然也惨遭毒手，未能幸免。反倒是原本为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的杨明辉，一变而为淞沪抗战时期市民团体反奸肃清组织的领导人。徐仲年本人竟然有过与杨明辉颇为相近的经历，“我自己呢？受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之嘱托，……主持法文宣传与法语播音。”这段经历及见闻，无疑为杨明辉在妻亡之后的救国与锄奸，提供了情感基础和生活积累。

而《双尾蝎》这样一部原本以留法学生的留学与归国生活为题材线索的小说，亦正式转入到国破家亡的抗战语境之中，原本怀着学术事业之梦想的杨明辉、袁瑛夫妇，也就此卷入战争与个人恩怨的漩涡之中且不得善终。

小说第三部分的淞沪抗战，无疑是同时期并不多见的正面描写上海市民团体积极支持抗战以及少部分国人的沦落投敌题材的小说。尽管《双尾蝎》在描写战争方面文学手法稍显粗疏简略，但在展现历史真实、尤其是描写上海市民阶层对战争之反应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尤为突出者有三，一是当时士兵的英勇无畏；二是汉奸的叛国无耻；三是市民阶级的同仇敌忾。《双尾蝎》大概第一次将两个留里昂的归国留学生，描写为分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对手：一个是爱国者，一个是叛国投敌者。而杨明辉放弃大学教授职位、投身于抗战阵营，并最终投身于抗日义勇军，这一故事尽管属于小说想象虚构，读起来甚至亦不免生硬，但在国仇家恨的交叉叙事之中，亦有其自然的情感逻辑与历史逻辑。《双尾蝎》亦就此而成为一部走出了纯粹的知识分子生活局限的抗战叙事文本，这在全面抗战刚刚展开的1937年是颇为难得的——《双尾蝎》的第一、第二两部分在1937年的10月即已完稿。

## 三

十多年前，我开始关注当年的里昂中法大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这一课题。其中，至少有两个事实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在中法大学前后四百余位留学生中，有五十多位所学专业为文科，获得博士学位者亦有二十余位，其中大多数成为后来国内法语教育和法国文学翻译研究的中坚力量，像张若茗、罗大冈、齐香、戴望舒、李治华、朱锡侯等；二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从事文学创作，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菲的创作成绩，其中，法语教育家、法国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徐仲年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就长期被忽略。

可能跟我在此方面写过几篇文章有关，此次徐大炎先生、徐昭英女士商议重新出版《双尾蝎》这部小说时，希望我能为之代序。其实我并非徐仲年先生在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方面的研究专家，但作为徐先生文学作品的一位读者，我乐于为《双尾蝎》的再版提供一点我自己早前的阅读心得，并期待着能有读者从《双尾蝎》的再版开始，对徐仲年先生以及当年中法大学的那批留学生——学者们曾经的学术工作与文学创作予以关注和重视。

2017年7月中旬于沪上  
《双尾蝎》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 笔会记录



①特洛伊古城残基  
②牺牲祭台  
③议事会残墟  
(沈坚摄)



# 特洛伊寻迹

沈坚

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描述的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曾险象叠出，引天下无数士子为之折腰、慨叹。神话耶，历史耶？随着19世纪考古发现的重大进展，蒙在故事上的神秘面纱正渐渐揭开，人们的目光也被导向土耳其海岸，东地中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沿线。特洛伊遗址，并非子虚乌有的虚构，而是实有其地。由于地处地中海通往黑海的要冲，那场战争即使曾经发生，也肯定不会如文学想象的那样是仅为争夺海伦，而更像是关乎夺取海陆控制权一类的战略需要吧。

作为一个学史者，去土耳其旅行，自然不会错过参访特洛伊。那天，我们一行是从西岸的盖利博卢乘渡船越达达尼尔海峡，沿岸小亚细亚一侧公路西南行，最终抵达遗址的。特洛伊遗址的确切位置，距达达尼尔海峡出口处的恰纳卡莱海峡已不远。

遗址入口处，竖立着一座当年好莱坞拍戏时制作并留赠的木马，多少显得煞风景，不过遗址的其余部分还是保护得相当完好的，不动手脚，原样留存，原汁原味，给参观者留下极大的想象余地。从遗址区展示的图片、文字资料可知，特洛伊遗址的考古揭露文化层，前后竟达九层，其年代跨度之大，实非可期，从远古青铜时代，直至罗马时代都有。具体说来，早在公元前3000纪—2000纪时，特洛伊一带便是个繁华的文化中心，为统辖周边农业社会的首府。自约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700年期间，曾一度出现衰落，无人居此。是战争的摧残，还是另有他因？在此之后，希腊移民开始进入，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此处称伊里昂。公元前6世纪后，该地区相继为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塞琉西王朝、帕加蒙王朝和罗马人统治。公元前85年，当地曾遭罗马破坏，随即由苏拉部分复建，奥古斯都和一些帝国皇帝也曾推进过它的恢复。但

随处可见的石砌围墙，块石成了最主要的建筑材料——这是当年的宫殿或城墙，豪宅或店铺，民居或剧场，神庙或祭坛？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你，进入一块文化圣地了，高兴的话，或许也可跟古人聊上几句。

古城的残基（图①），十分明显。不同时代的堆积层，尽管相当丰厚，但裸露的部分仍不少，无不溢着重要的文化讯息，引起考古学家的浓厚兴趣。从对埋藏物的分析可知，早期的特洛伊可能是个要塞，政治统治中心，有国王的宅邸。据推测，那时特洛伊的居民可能来自希腊爱琴海沿岸、基克拉泽斯群岛、克里特岛及大陆上小亚细亚一带。到了第八个文化层时期，开始出现了最初的希腊移民地。叠压在上第九个时期自然最为晚近，一般认为就是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称作伊里昂的那一时期。遗址区的个别地段，为了清楚标示这样的考古文化分层，也颇具眼光地明确标上了拉丁数字的一二三，以向非专业的多数参观者普及一点考古常识，这是很可贵的理念。

我们来到，一些当年可能为民居的房屋内墙，涂有一层红泥，跟现今某些乡村地区依旧可见的习惯几乎无异。而豪宅风范也往往显而易见，譬如，我们看到一处依地势建于高台上的豪宅遗迹，连带着精心铺筑的宽敞下坡石道，应为当年院内马车的出行之路。遗址管理部门给游客提供的复原图上，便清晰

展露了这当年的样貌，显得十分气派，与周围普通民居适成鲜明的对比。在当时的特洛伊，平民和富豪的住宅并存，业已判然两立。但同时，也还有一些城市市民共同使用的公共建筑，今人不难辨识。例如特洛伊的牺牲祭台（图②），那是定期宰杀牲畜、向神献祭之所，这种献祭的圣所在古代社会常是不可或缺的。此处的祭台为正方形高石台，祭品置于其上，一侧还有圆形水井，长方形牺牲台。宗教祭拜活动，对当时的城市市民来说，无一例外，都会参与的。还有神庙，也是众人会聚的地方。从尚存的圆形立柱残部、柱础和倒地的石柱断片来看，当初这里的神庙尽管不大，还是有模有样的。特洛伊如同那些典型的希腊城市一样，也有通过议事会的讨论和争辩来决定城市重大事务的传统。我们看到的特洛伊议事会建筑（图③），是一处半圆形的石结构建筑，有层层石阶，类似希腊露天剧场，只不过七八层台阶，不高。这样的规模和范围，实难容下全城市民围观竞技，但城市精英若开个会议议事，却也足矣。

早先一说特洛伊，总离不开战争，希腊大军的战舰一直抵及特洛伊城下，要弄木马计留下的那个藏了伏兵的大玩具，也是海上载来的。所以，印象里的特洛伊城似乎紧靠大海，蔚蓝色的海洋岸线直通城墙，给两军对垒的战场也没留太多空间。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那部好莱坞特洛伊大片的外景选择或制作，也是按的这一思路。然而，真到特洛伊实地看了，却已不是那么回事。如今的海岸线，早已退到七八公里以外的视线尽头，三千年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使得海岸线已远离当年的特洛伊城。坐在废弃的古城废墟上，抬眼眺望达达尼尔海峡波光粼粼的水色，竟难于复见，已是那么渺远，那么不可思议了。念天地之悠悠，感时空之渺渺，从神话到现实，亏得谢里曼啊！